

村寨

侗

族

贵州黎平县九龙村调查

主 编：刘 锋
龙耀宏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云南大学出版社



侗

族

贵州黎平县九龙村调查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 编：刘 锋
龙耀宏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侗族：贵州黎平县九龙村调查/刘锋，龙耀宏主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高发元主编）

ISBN 7-81068-776-X

I．侗… II．①刘… ②龙… III．侗族—居住区—调查报告—黎平县 IV．K2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5973 号

侗族——贵州黎平县九龙村调查

主 编：刘 锋 龙耀宏

责任编辑：张丽华

责任校对：吴蔚丽

装帧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1/32）

印 张：19.625

插 页：8

字 数：483 千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68-776-X/C·59

定 价：40.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电 话：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0871-5162823

总 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在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 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 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D.G. 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000 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 年 7 月～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 15 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 110 人，占 54%（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干部 11 人，占 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 人，占 40%。调查队伍

^① 调查由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1 本专题研究报告、1 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 1 300 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以中青年为主，其中 45 岁以下 170 人，占总人数的 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 作为云南大学建校 80 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 and 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 32 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 这次调查的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 个省区的 41 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 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31 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 1 500 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 166 页。

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32本,文字总量1000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3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30万字;1本调查工作实录28万字。此外,32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10000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32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004 年 5 月

前 言

在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领导小组的精心组织和策划下，我们承担了对侗族的调查任务，并按照与相关单位合作调查和实行双组长的原则组建了调查组。云南大学方调查组由三人组成：组长刘锋，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组员张全辉，云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组员王玲，云南大学马列部学生。合作单位为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系，由五人组成调查组：组长龙耀宏，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系副教授；组员潘永荣，贵州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组员潘盛之，贵州民族学院旅游系副教授；组员王继英，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系副教授；组员吴培安，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师。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系 2000 级的石成艳、吴兴武、陆琪连，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马国君，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吴文仙也参加了这次调查活动。云大组成员于 2003 年 7 月 15 日离昆赴筑，与合作方商讨调查事宜。我们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咨询研究侗族的专家，优选了两个有代表性的调查点。我们严格按照选点要求，在 7 月 18 日至 19 日实地踏勘后，我们综合各种指标，确定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永从乡九龙村九龙寨实施此次调查。我们从 7 月 21 日至 8 月 28 日在该寨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

一、侗族概况及选点依据

侗族是古代数百越族系的一支，新中国成立后，才定名为侗族。从地理分布看，侗族分布在中国西南部，约在东经 108 度至 110 度，北纬 25 度至 31 度之间，东西宽约 350 公里，南北长约 600 公里，方圆近 20 万平方公里。从行政区划看，侗族主要分布于黔湘桂鄂四省（区）比邻地区。全国侗族人口近 300 万，贵州省侗族人口约占其中的 55.7%，贵州省侗族人口主要集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口约有 140 万。此地处于贵州高原东南端，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 200 米到 2 000 米之间。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处于侗族聚居区的中间地带。黎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湘、桂三省交界的向湘、桂丘陵过渡地段，东经 108 度 37 分至 109 度 31 分，北纬 25 度 44 分至 26 度 31 分。东与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交界，南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接壤，西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北邻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剑河县。总面积为 4 441 平方公里，侗族人口约为 35.4 万，占全县总人口的 71%。而我们的调查点九龙寨正位于该县的中南部，是侗族最聚居的地带之一。

侗族地区按语言划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区。北部方言区侗族文化变迁较快，甚至有的地方只能使用汉语，有的是恢复民族成分而认同侗族的。南部方言区由于有近两百万人连片分布的聚居区，中间地带没有其他文化隔离，整体文化与社会环境和自然背景较为一致，他们的日常交际基本上只使用侗语。我们寻找的是文化层面上的侗族，即已知传统的文化要素，至今还

较多较明显地存活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即使发生演化也仍然有踪迹可寻的这部分侗族群体。1949年以来，研究侗族的学者都把目光投射在南部方言区，这为我们的话语构建以及调查点的寻找，提供了极具参考性的框架。

目前侗族的资料积累及其研究成果，大部分来自南部方言区，而且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第二土语区。南部方言第二土语区具有下述特点：“南部方言第二土语是本方言惟一集中连片的一种土语，也是侗语各土语中分布面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土语。它包括黎平县（除洪州外）、榕江县（除车江外）、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除程阳外）的大部分地区和从江县整个侗族地区，以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一些侗寨等。南部方言第二土语区也是目前侗族传统文化保持得相对完整的一个区域，如侗族有名的多声部歌只流传于这一土语区内，侗戏也诞生于该区，很多传统故事、歌谣及‘萨’文化等也是源于该区。”（潘永荣，见本书《语言文字》一章）也就是说，南部方言第二土语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它不但继承传统，而且推陈出新，这与其他侗族地区残存一些传统文化要素，或者全盘接受异族文化是不一样的。总之该区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诸多要素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产生出来的新起文化要素都一并存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而该区具有的文化事象是其他地区所没有或者很少见到的。

以此地为调查点，可以管中窥豹，既能了解侗族南部地区的现实文化状况以及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同时也能透视北侗地区的文化底层及其演化情形。

从经济发展看，九龙寨处于南洞地区的中等水平。九龙寨是原三龙乡乡政府的所在地，从1932年到1992年历经多次撤并，就说明了该地的这种经济发展状况，比如它没有潘老、下江等地发达，但却比其他更偏僻的地区如坑洞等地发展快

一些。

1958年至1959年，向零、吴景秋等人对三龙地区的中寨、罗寨、新寨进行了两次调查，1963年他们编印了《贵州省黎平县三龙乡侗族社会经济调查资料》。20世纪60年代贵州大学在九龙寨收集侗族大歌。1987年贵州民族学院民语系在九龙寨收集民间文学资料。这些调查资料对我们此次调查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使相关资料得到了有效的承接，厘清了一些文化现象几十年来在三龙地区的变迁的线索。三龙地区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单元，作为三龙地区首寨的九龙当年未做适当的调查，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缺憾，因而把调查点设在九龙寨，以三龙作为完整的一个社区来关照这些资料。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是把前人调查资料作为旁证或者潜在的参考系来加以使用。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承接前人的资料，再方面可以获取完整的社区资料，从而有利于观察分析调查点的或者调查点和整体社区的文化运作状况。

综上所述，我们选点的依据是：第一，在这个民族的传统聚居区布点。第二，在体现该民族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的地区选点。第三，做好现实文化各系统与传统文化要素分布状况的探索性调查。第四，重视相关文献积累。调查点有相关文献积累越多，就越有利于建立参照系，越有利于追踪调查和深度搜集资料，也有利于相关资料承接，厘清文化事象的演化脉络，减少调查误区。因此我们特别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资料。第五，持社区整体观。一个村子并不是在孤立地活动，它还与别的村子形成各种关系，从而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社区。因此选点必须关照到整个社区的情形，同时注意到调查点在整个社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些关系也是文化规则的一种体现。第六，社会发展取其中等水平。比如教育、经济等无论发展太快或者太慢，都不能代表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发展水

平，惟有取其中才能说明这个民族或地区的一般发展状况。我们选点的依据正与此次调查的宗旨相吻合。

二、点上情况

九龙村位于贵州省黎平县西南部，属永从乡管辖。该村距离县城 41.5 公里（公路）。九龙村由九龙、己畔、归良、平脉、井庭、合水、高牙、牙旺、平洋、己国、地海等十余个自然村寨组成，一共 22 个村民小组，720 户，3 200 人，其中九龙寨有 9 个村民小组，302 户，1 476 人。该村国土面积 34.5 公顷，耕地面积 2 386 亩，水田面积 2 206 亩。九龙寨坐落在两面群山连绵的峡谷坝区，其余村寨点缀于各个山间较为平坦之处。

在现在的九龙寨里，即原乡政府驻地立有一块碑，碑文反映当地的一些情况，兹摘抄如下：

九 龙

位于县城西南 20 公里（直线），三龙乡政府驻地。

1 190 人，侗族聚居，村址依山傍水，民房为木架瓦面及木皮盖顶结构。有林区公路与黎从线相连。因流经村前的九龙河一段有九个深潭，据传每潭中有一条龙，故名。海拔 560 米，年均气温 16 摄氏度，无霜期 280 天。产水稻、棉花、木材。有侗乡歌海之美称，文艺活动丰富多彩。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置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 年建立三龙乡，1956 年撤乡，1963 年 11 月成立人民公社，1984 年 5 月社改为乡。

有小学 1 所。

黎平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1992 年撤三龙乡并入永从乡，原三龙乡被划分为两个行政村，即九龙村和中罗村。

九龙为汉语地名，如上述碑记所载，传说流经寨中的河流有九个深潭，每潭有一条龙，故名。这是比较汉化的说法。其实侗语的九龙有“限定”或“规定”之意，当地人有多种解释，较为可信的有二：其一是说九龙寨的鼓楼历来为三龙地区的总鼓楼，因而规定议事在这里举行。其二，无论在那里抓到盗贼，也是限定在九龙的鼓楼里捆吊审讯。这样看来，该地名来源于九龙鼓楼的社会功能。

九龙人传统上以稻米为食，以林木为用。人工营林也较为发达。1999 年实施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限制人们对森林的砍伐，大多青年人外出打工以弥补家用。此外，各家各户饲养猪、牛、鸡、鸭、鹅，稻田养鱼，以及种植玉米、红薯、洋芋、早稻、花椒、辣椒、土烟、百合等。这些产品大多自用，少部分在市场上出售。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他们开始种植杨梅、柑橘、板栗、柿子等果树和天麻等中药材。

九龙寨全是侗族，只有几户是外地来的汉族，但已完全侗化。九龙除了这三家外姓（石、袁、刘）外，其余皆姓吴。他们说他们祖上来自江西吉安府太和县，但较为可信的说法是从梧州迁来。他们原来是同一个宗族，后来分宗开亲，按他们的说法就是变成六个“房族”（他们没有分清家族与房族的汉语概念）。这六个“房族”是：宰门、腊甲、腊九、腊汉、腊降、

腊筒，“内姓”分别是陈、宋、搃、金、龙、唐，而他们“外姓”都姓吴。除腊甲、腊九不可通婚外，其余“房族”均可互通婚姻，据说腊甲、腊九为同父异母所生。因此，有时他们又把腊甲、腊九视为一个房族称为“甲九”，房族也算做五个。他们的学名均是吴某某，但是已死之人在家里的神龛上或者在墓碑上则写着“吴婆陈（或宋、搃、金、龙、唐）太君”。看来“外姓”是对外面社会用的，而“内姓”则是在本地区使用的，而且是成家后有子女的女人死了之后才用的。这样看来，“内姓”应该是某个“房族”女人的死后的姓。据调查使用“外姓”比“内姓”早，“内姓”在民国年间才开始启用。我们进一步调查得知民国年间当地已经有了一些读书人，这些人在与外人接触的过程中因同姓结婚遭到别人耻笑而启用“内姓”。与九龙村相邻的中罗村之罗寨，已把原来的“内姓”何、汤、龚、张转化为“外姓”，但本地区都知道他们是吴姓家族，而在九龙寨还没有“内姓”转“外姓”的情况。显然无论“外姓”或“内姓”的启用都是适应汉文化的结果。

九龙寨有3座鼓楼，1座风雨桥，2个“萨”坛等公共设施，各有其聚会、休闲、宗教等社会功能。著名的三龙大歌发源于此。“饭养身，歌养心。”是这里人们的谚语，也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劳作或休闲，也无论是行歌坐夜，或陪亲送客，他们都离不开歌。歌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男女老少都会以歌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以歌来交流思想感情，以歌来美化生活。逢年过节他们不仅要唱大歌，而且还要演侗戏，吃相思，吹芦笙。

1971年修通从九龙至长春堡的公路，改变了这里的封闭状况。1998年的农网进寨，电视、电风扇、电饭锅、冰箱、VCD等进入家庭，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1979年与1997年各发生一次火灾，也改变了这里的住房

样式和居住格局，人们从楼上生活变成了楼下生活，从密集聚居到分散居住，还有部分人家把传统的木房变成了现代的砖房。

尽管九龙社会在发生演化，但传统文化要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仍有踪迹可循。与文献记载比照，其显性的要素略举如下：

“峒人椎髻，插雉尾。”（《粤西笔述》）“椎髻插雉尾，卉衣。”（《广西通志·诸蛮》）今天九龙妇女仍然挽发为髻，插羽翎为饰，有的已经演化为银饰所代替。妇女们还在穿着传统绣花的衣服。

“手搏饭，以鱼鮓为上食宴客，杀牲用剪无砧。”（《粤西笔述》）在九龙我们还亲自参与了用手抓食糯米饭，而且捏得越紧越好吃。他们把我们当成贵客，我们才吃上了腌鱼。也看到了他们在祭奠时，用剪刀剪肉。

“南越巢居。”（《博物志》）“依树积木，以居其上，曰干栏。”（《魏书·僚传》）九龙在未发生火灾之前，普遍是干栏式建筑，房屋底层饲养牲畜，堆放杂物，楼上人居，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一些人家如此居处。

此外，侗族地区以“洞（峒）”为地名最多，这是宋代在侗区设立“溪洞（峒）”制度的遗存。九龙所在的三龙地区，历史上称其为“三洞”，现在民间仍然如此称之。

三、调查的方法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除采用观察、参与、统计、问卷、抽样、座谈、摄影、录像、录音等方法外，还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

我们的调查成员构成可分为两部分：云大组成员为非侗族，他们是在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合作组成员全是侗族，而